

高风险区又增，抗疫要善用湖北保卫战经验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刘晶瑶

1月13日晚，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惠七镇调整为目前全国第二个疫情高风险地区。这一消息让很多人颇感意外，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公众的注意力大都聚焦于11天累计发现326例确诊病例、234名无症状感染者。大家没注意到，自1月10日望奎县新增8名无症状感染者以来，黑龙江近4天累计感染者已超过150人，而且在吉林、山东等地都已经出现关联病例。

在新冠病毒较量一年后，我们完全有信心阻击目前多点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但是，河北、黑龙江两地在较短时间内

迅速出现不少感染者，尤其目前全国仍有70多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事，无时无刻不在警示我们：疫情防控决不能松口气、歇歇脚，冬春季防疫形势依然错综复杂，须臾不可大意。

好在我们经历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从政府、专家到医疗机构、普通群众，在抗疫斗争中积累了很多成熟经验。比如，如何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确定病毒传播路径，如何集中隔离、调配防疫物资，如何有序落实居家隔离、交通管控，如何发动社区志愿者、做好群众宣传……

新冠病毒有很多谜团至今仍未研究透。在疫情应对上，此前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世界各国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抗疫之所以能够取得相对较好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我们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推广湖北等地抗疫的成功做法，并依

靠制度优势，最大限度地实现科学防控、精准防控。

正因如此，无论是新疆、辽宁还是北京、河北，在应对散发疫情、局部聚集性疫情方面，总体都比较有序和高效。抗疫是与时间赛跑，现在我们更清楚以什么“姿势”能跑到前面，更清楚什么“装备”好用，比如河北这次仅用21小时便建成投用单日最高可检测100万人份核酸样本的“火眼”实验室。抗疫是与狡猾的病毒较量，现在我们对“对手”的基因有了更多了解，也更清楚其“弱点”在哪里，比如，公布病毒毒株源头已是常规动作。

不过，我们对当前抗疫工作抱有信心的同时，也一定不能有懈怠思想、轻敌情绪。毕竟，辽宁、河北等地最近都出现了“超级传播者”案例，这说明新冠病毒仍存在迅速扩散的可能；过去几天里，山

西等多个省份都已出现自河北输入的感染者，所幸及时发现并采取了有效措施。这提醒我们必须排查堵住任何可能的防疫漏洞。

尤其要注意的是，从近期媒体报道看，疫情防控网还需要织得更加密实。比如，有的确诊者隐瞒活动轨迹、密接人员、发病就诊等情况，有的群众在居家隔离期间翻越小区围墙擅离职守，有退休干部不戴口罩闯卡还辱骂防疫人员，有人冒用虚假健康码，还有人违规从高风险地区跨省返乡……

与新冠病毒斗争一年后，我们抗疫不是“新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仅仍有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的地方要保持警惕，各地都必须从既往抗疫经验中汲取教训，坚决避免落而不实，才能彻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辛识平

“石家庄加油！河北加油！我们来了！”当石家庄等地因新冠肺炎疫情按下“暂停键”，各地驰援的“快进键”迅速启动。医疗队来了，先进仪器来了，生活物资来了……同舟共“冀”的真情在燕赵大地流淌，让人们在寒冬感受到温暖与希望。

与疫情较量，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短时间内，12支252人国家检测支队驰援河北。在各方大力支援和协助下，河北核酸日单检能力达到110万份，石家庄3天内完成1000多万人的核酸检测。令人惊叹的速度与效率，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硬核支撑，更展现了团结一心、共抗疫情的洪荒伟力。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同样温暖人心的，还有对百姓生活的关心。新疆库尔勒市为石家庄送来10000箱库尔勒香梨、10000个馕和200只羊，数百名武汉志愿者向石家庄市民捐赠50吨蔬菜……人间烟火气，点亮着平凡的生活，也激励着与疫情抗争的人们。无需华丽的语言，一句“‘缸炉烧饼’挺住”的加油助威，总是让人感到心里暖暖的。

守望相助，心手相牵，这份同胞情谊血浓于水。去年，河北千余名医务人员千里支援武汉的场景令人难忘；如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派出车载移动方舱CT驰援河北，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迅速组建援冀重症医疗队待命。“当初河北人民帮助了我们武汉，我们要感恩”，正是这样的真情大义生生不息，让一批批逆行者英勇出征，一次次激发出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的强大力量。

人心齐，泰山移。面对疫情，燕赵儿女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每一支驰援的队伍，每一份真诚的祝福，每一批抵达的物资，都在传递着同舟共“冀”的暖流。“我们是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是战胜疫情的最大底气。正如一个网友所说——热干面挺过来了，炸酱面挺过来了，担担面挺过来了，缸炉烧饼也一定行！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同舟共「冀」见真情

草野·字下

姚孝平

前几天严重冰冻，好多农户家的自来水管都冻坏了。一天，我家的水管刚修完，村民长林拄着拐杖来找我，说家里水管坏了，要我帮他打电话给水务集团请人来修理。

78岁的长林报不出子女的电话，也不会打电话，我就叫他回家等着，免得水务公司的人来了家里没人。

这几年，村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都住到了城里，孩子也跟着在城里上学，只留下老人在农村。

家里遇到什么突发急事，比如灯坏了、水管破了、空调出问题了，年纪大的老人往往手足无措，得不到及时解决，甚至发生危险。像我奶奶独居，有时电灯坏了，她晚上只好摸黑，好几次都摔倒了。她出去叫人，村民都关门上楼了，也听不见她求救。

一个家庭，每天都会有生活需求，诸如修修补补、采购食物、取钱等等，都是小事，但对上了年纪且身体有病又没文化的老人来说，是很大的难题。家庭的正常需求，随着年轻人的搬离留下了空白。除此之外，老人还关心养老金的增加、看病报销比例是不是又提高了、种粮补贴有啥变动等政策，很多信息他们都不知道找谁问。

老是去麻烦村上的年轻人，一来不一定能及时找到人，二来有的年轻人还嫌麻烦不愿帮忙，三来一些留守青年也不一定懂。这一块需求需要有一个人来集中管理。

我建议在行政村设置一个职位，这名村干部专门下沉村民小组，根据情况选择一家农户办公，村民可随时上门找他(她)。工作内容就是收集村民各种合理需求，大事小情都记下来，根据具体情况归类，急事急办，不太急的可放一起办，做百姓的生活服务员。

另外，还可向村民宣传一些政策，如垃圾分类、环境整治、家电下乡、人口普查，也可举办小型座谈会，听村民诉说有哪些难处、有什么需求，还应针对个体情况，对老人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村干部一般是本镇人，所以可能比驻村干部更贴近当地村民，便于交流和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

增设专职生活村干部，不仅能帮助村委会更好地与村民打交道，更好地工作，对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具有现实意义。



新华社南昌1月12日电（记者李美娟）为了持续推进“减证便民”行动，优化营商环境，江西省推出新举措——全面推行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这意味着群众和企业在全省各级行政机关或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办

理有关事项，如果具备符合要求的材料，就不用出示有关证明，仅需书面承诺，行政机关即受理行政事项。

本报评论员黄筱

每日快评

近日有网民爆料，某应用软件商店出现了一款名为“健康码演示”的产品，可以根据用户个人需求，随意显示各地健康码、复工码、通行码、绿码、黄码、橙码、红码等状态也可“按需定制”。在国内多地防疫形势仍比较复杂的背景下，该产品上架半年多已迭代更新12次，下载量已超千次。“高仿健康码”到底意欲何为？科技作恶的后果不堪设想。

用于疫情防控的健康码，是当前国内公共场所防疫的第一道关口，管理人员能够快速地初步识别重点人群并采取措施。进入地铁站、公交车、大型商场、办公楼、医院，“亮码”“扫码”也逐渐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

科技向善，让生活更美好；但科技作恶，第一步就偏离了正道。当居心叵测者炮制“高仿健康码”，那些原本可能有感染风险甚至已感染的人员，就能在公共场所自由进出，还能跨省流动，极有可能成为疫情扩散的导火线。

“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市场”，这是生意人眼中的“王道”，但不当需求、违法需求也应该支持吗？制造这种“神器”的人，或是为了博眼球哗众取宠，或是为了彰显自身产品的技术高明，但只满足目标用户需求，枉顾广大公众的生命健康，扰乱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涉嫌违法犯罪。

像类似变了味儿的“科技产品”不一而足，例如，有企业研发了监控员工工作状态的“智能坐垫”，有企业开发了专门计算工作如厕时间的计时器，有企业则用大数据分析“专杀”熟客。这其中，有些产品是越过了法律边界，有些产品则已触碰了人性底线。

游走在边缘地带的所谓“高科技”，终究会作茧自缚，不仅赢不了市场，反而会落下一地鸡毛。

“韩式防疫”改变了什么

本报评论员杜白羽

去年12月底，我从北京飞往首尔。彼时，韩国日增新冠感染者上千，疫情防控等级已上调至次高级（2.5级）。因报道需要，新华社派我“逆行”增援。

首都机场候机大厅空空落落，机场免税店店门紧锁，航班上座率不到一半。登机后，身着防护服的空乘给每个人发了一沓厚厚的表格。根据韩国的防疫要求，入韩人员须隔离14天，可前往指定酒店集中隔离，持长期签证者可居家隔离。

飞机降落在仁川机场，出境时新增了多个检疫环节。一是增设服务台，协助每个外国人下载居家隔离APP，如每天三次按时测温打卡；二是核实每名入境人员在韩的联系人和电话，工作人员会现场拨通电话确认信息；三是行李抽查，找到我托运的行李时，发现箱子上多了一把“请配合通关检查”的黄色铁锁。

临近元旦的首尔，依旧红绿绿，但昔日繁华的商业街如今冷清萧条，一些商店关门挂起“租赁”的牌子，品牌店门口写着BIG SALE（大甩卖）。林立的咖啡厅如今只能外带，也没了生意和氛围。“韩式防疫”给人以“外松内紧”之感——政府和社区更多的是指导协助，主要靠的是民众的自觉自律，没有谁严格看管。比如，我隔离期可以步行去保健所。

第二天，我要去做核酸检测，按规定预约了防疫出租车，司机仅用5分钟就将我送到了。在临时搭建的检测站外，一米线隔着排了十几个人，检测完毕，我步行返回住处。

从第二天起，保健所每天下午3点会准时打电话来，询问我的健康状况。手机每天收到七八次“紧急警报”响铃通报，比如，所在区域最新确诊人数；比如，请某一时间段去某户人家蒸房的居民自觉接受核酸检测；比如，节日期间请居民注意社交距离，不聚餐少外出，多通风换气……

收到第二次检测阴性的结果后，隔离结束。我和同事们驱车出门，雪霁天晴，零下19℃的汉江结了厚厚的冰。街上行人几乎不分年龄、性别、身高，清一色都穿着长款黑色羽绒服。谁能想到，因为疫情，韩国女生冬天穿丝袜露腿的潮流不再，高度雷同的黑羽绒服成了标配。

警惕犯罪分子诱使农民工和学生当“工具人”

焦点观察

本报评论员刘芳洲

近年来，一些打工者、在校生成为诈骗犯罪帮凶的新闻屡见报端。诈骗分子在这些“工具人”身后，隐藏得越来越深，不仅将本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特殊群体拉下水，严重损害受害者利益，也增加了铲除相关黑灰产业链的难度。当前，亟待加强对特殊群体的保护与引导，对“黑灰产业”组织者和参与者严打重判。

据公安部数据，2020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持续深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5.6万起，“刷单”诈骗案件占比由2020年初的25.3%下降至13.8%。但是，仍有大量案例表明，电信网络诈骗的链条上，许多农民工、大学生等群体处在中间位置，正在成为犯罪分子的“工具人”和“帮凶”。

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辍学的社会闲散人员、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或在校学生，正是利用了他们想赚“快钱”的心理或缺乏社会经验、法律意识淡薄的特征。诈骗分子一般会打着招聘“兼职”等旗号，收集他们的个人信息，进而在线开户或申请注册公司，用来转账和洗钱。有些人明知这些事不合常理，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也选择主动做“帮凶”，成了诈骗分子设置在司法机关之间的屏障。

犯罪分子盯上特殊群体、“黑灰

产业链”难以被整体铲除，也暴露了现阶段打击电信网络犯罪的一些问题。

首先，司法治理与不断升级的网络犯罪手段间仍存差距。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更新换代的信息技术平台，转移风险较大的环节，造成司法机关抓到的产业链“下游”人员居多，这说明新技术平台或成为司法实践尚未监管到位的“空白地带”。

其次，有关部门对电信网络犯罪的打击不够全方位、深层次。目前，针对电信网络犯罪，外围易剪除，证据链难闭合，在查清多少就指控多少的基础上，打击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对“帮凶”量刑过轻，也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严重情形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且对许多“黑灰

产业链”环节并不适用，违法成本太低。

解决“工具人”掩盖犯罪事实的现象，打击“黑灰产业”全链条，首先要加强对农民工、学生等群体的保护与引导。网络社交、求职平台运营商及网信部门要加强对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的监管力度，司法机关加强与民政、教育、人社等部门等就业相关单位联系，积极引导大学生、求职人群通过正规途径求职就业。

其次，相关部门要加强专业化打击与协同集成打击能力，在较为专业的领域，可借助相关专家与技术人员的力量。

同时，要加大对手机卡等“实名制”管控力度和对公账户等的金融监管、治理力度。只有完善法律法规，对“黑灰产业”从业者应加大惩罚力度，才能通过严打重判起到震慑作用。